

类型学视域下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黄巨臣 郭梓华 萧 然

摘 要 试点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在政策运行中,试点扩散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落地和创新的本土化机制,并逐步内嵌于职业教育复杂实践活动之中。基于类型学思想构建“政策类型—扩散方式—驱动机制”分析框架,从本土府际关系和政策“清晰—模糊”维度划分出发,以纵向逻辑归纳出“中央清晰—地方模糊”“中央模糊—地方清晰”“中央清晰—地方清晰”三种职业教育政策类型,以及相对应的“自上而下的科层传达式”“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式”“上下结合的联动推广式”这三种典型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试点扩散活动背后的“政治政绩”“社会需求”“经济效益”三大驱动机制,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政策;政策试点;政策扩散;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15-0051-06

一、问题提出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1]作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支撑性工程,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相关政策的创新引导和改革驱动密切相关。受“先抓重点,后全面推广”的公共政策运作逻辑影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在创新过程中逐步形成试点扩散这一极具本土化特色的机制。政策试点是指在出台正式的政策制度之前,先在小面积、

小范围、小规模内进行政策方案的试行,以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和风险,为全面推广积累实践经验^[2]。而政策扩散指的是一种政策方案的跨区域或跨部门传播,进而被新的政策主体接纳并予以实施的过程^[3]。为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政策的试点扩散工作,鼓励各政策主体不断开展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改革创新探索,在试点过程中总结经验,为政策扩散奠定坚实基础。例如,202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明确指出:“要接续推进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对各地实践形成的制度性成果予以总结并“强化经验推广”^[4]。随着职业教育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其政策的试点扩散工作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

作者简介

黄巨臣(1990—),男,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治理(兰州,730000);郭梓华(2000—),男,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科研助理,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治理;萧然,广西医科大学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重点课题“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招生管理机制优化路径研究”(2022ZJY3042),主持人:萧然

关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研究尚不充分,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研究,如熊亮州基于对职业本科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归纳出“进入议程—政策输出—政策扩散—政策执行”的政策试点扩散过程^[5];二是关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作用研究,如芦艳通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分析,得出其具有为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拓宽格局、指明方向、提供标杆等积极作用^[6];三是关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问题障碍及对策研究,如崔志钰等从“试点方式、推进和内容”三个方面分析当下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问题,并提出“创设常态化的政策环境条件、形成整体性的进阶推进机制、进行适时性的任务评估反馈”等应对措施^[7]。上述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作用和现实问题,缺乏对其运作模式的归纳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将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构建“政策类型—扩散方式—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进而探究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方式,并总结其驱动机制,以期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政策类型—扩散方式—驱动机制”： 基于类型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类型学是源起于考古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指将同一门类的物体,根据其形态特征,分成类型并研究其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8]。“类型划分”是推进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转变的重要方法,也是对某一现象或物体的不同特质进行区分和控制的开始^[9]。根据埃米尔·迪尔凯姆以“分类”作为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在处理复杂的社会事件时,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将研究对象拆解成多种类型,以便于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10]。在公共政策领域,受政策过程和政策主体的复杂性影响,研究者通常会基于一定的分类标准,将政策类型进行区分和讨论,其中“模糊性”是进行政策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11]。所谓政策模糊性指政策的目标、受众、范围、评价等内容要素缺少清晰的规定^[12]。尤其是受央地关系深刻影响的职业教育政策更是如此,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3]。与此同时,政策的模糊性与清晰性相对应,二者的强弱和所处具体情境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政策试点扩散方式。从扩散方向上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上下结合等^[14],而驱动政策扩散的机制有模仿、竞争、学习、行政指令等^[15],实则反映出的是更深层次

的政治绩效、社会需求、经济效益等驱动。

职业教育政策试点作为一种具有典型公共政策扩散特征的活动,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同样需要引入“类型”“方式”“驱动”这些关键维度,构建“政策类型—扩散方式—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以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学理性,深入了解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实际样态。

三、不同职业教育政策类型的试点扩散方式

在职业教育政策推行中,相较于西方联邦制国家相对分散的政治结构,中国的政策试点扩散是建立在纵横交织的府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央地政府权力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而中国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过程的核心特征在于现存制度环境中地方和国家的协商互动。在这一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央地双方面临的政策情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二者对职业教育政策信息的理解和解释也存在一定不同。因此,在分析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中,基于“政策类型—扩散方式—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采用李兆友等人提出的职业教育政策“模糊—清晰”的类型划分维度^[16],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大政策主体纳入考量,以二者对政策信息的清晰程度为标准,进而划分出“中央清晰—地方模糊”“中央模糊—地方清晰”“中央清晰—地方清晰”三种政策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相应的“自上而下的科层传达式试点扩散”“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式试点扩散”“上下结合的联动推广式试点扩散”三种方式。

(一)“中央清晰—地方模糊”：自上而下的科层传达式试点扩散

“中央清晰—地方模糊”的政策类型,主要指在政府科层式组织框架中,中央政府明确选择和采纳某项政策,并对其实施方案和配套机制有较为清晰明确的布局,而地方政府相对缺乏自主实践经验,主要负责接收上级的行政指令并实施该项政策,形成一种科层传达式的试点扩散模式。在职业教育政策自上而下的科层传达式试点扩散方式中,中央政府有相对明确的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细则和考核标准,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或职业院校根据上级要求探索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执行方案,在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高位推动、纵深发力来引导地方政府积极作为^[17],引导职业院校有序参与试点工作,学习借鉴其他试点单位的有益做法,以提高政策试点扩散的质量和效率。以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为例,自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

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后^[18]，教育部、人社部和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等具体实施方案，为现代学徒制的试点扩散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支持性配套措施。在中央政府的科层式传达下，地方政府和各职业院校按照上级的要求并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和办学特色，积极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以满足上级的考核标准。例如，作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排头兵，江苏省教育厅于2016年9月发布《关于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省域内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目标、要求、任务、工作程序及保障措施进行统一部署，对各试点职业院校进行积极动员。其中，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依托相关政策文件的精神，结合自身办学优势，在社会遴选一批优质合作企业，实行“多企一校”组合配对以组建现代学徒制班级。通过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该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显著提升，试点成效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19]，其优秀实践经验也逐步向省域内乃至全国各职业院校扩散。简言之，受我国政府组织的层级化以及信息不对称性影响，当中央政府掌握清晰的政策信息而地方政府相对模糊时，中央政府往往会采取行政指令的形式进行职业教育政策的试点扩散工作，并依照相应的评价指标定期监督其试点成效，及时总结试点过程中产生的制度性成果并予以推广，逐步形成自上而下的科层传达式试点扩散方式。

（二）“中央模糊—地方清晰”：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式试点扩散

“中央模糊—地方清晰”的政策类型，主要指在一些创新性领域中，中央政府对政策信息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而地方政府率先通过试点掌握了较为清晰的政策经验，并形成高质量的政策选项，自下而上地吸纳进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经过相应的行政程序逐步辐射到更大范围，形成一种吸纳辐射式的试点扩散方式^[20]。在职业教育政策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式试点扩散方式中，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对政策的试点工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自身面临的教育情境选择创新性的试点方案^[21]；而中央政府侧重于把控政策创新方向，一般负责对地方政府提交的试点方案予以审批和授权，并对试点过程中取得的实质性成果进行总结，加快建章立制以推动该项职业教育政策在全国范围扩散。以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为例，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推动公办职业院校走集团化办学的路子^[22]。但是中央政府对于职业教育

集团化办学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相关政策文件也并未对其改革方式作出明确要求，这种相对宏观和模糊的政策指引给予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较大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广东省早在2003年就开始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2003年，在广东省政府的统筹安排和政策扶持下，省内第一个职业教育集团——惠州商校职教集团正式成立，并在试点过程中总结出“三环对接”的新型办学模式，即打造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实习就业三环紧扣的教育产业链，逐步形成融公办中职、民办中职、民办培训、民办义务教育于一体、在校生超过万人的综合办学实体，其集团化办学经验受到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表彰^[23]。在惠州商校职教集团的创新精神辐射下，其他职教集团从自身的区位特色和优势资源出发，积极探索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新模式。例如，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的“集群对接”模式、联通中高等职业院校的“中高贯通”模式、推动产教融合发展的“校企一体化”模式等，极大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践经验。针对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的试点成果，中央政府积极吸纳并推动其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政策扩散。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24]；同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前期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进行集团化办学试点的成效予以肯定，并以政策激励的形式明确了未来职业教育集团的重点发展类型、组建方式、治理方法等，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全国范围内扩散提供政策指引。概言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中，仅依靠中央政府来实现政策调控是不现实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各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创新性，能够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过程中检验其科学性和可行性，总结各地经验教训，增强政策的适用性，以便中央政府进行统一部署并推动政策扩散，以形成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式试点扩散方式。

（三）“中央清晰—地方清晰”：上下结合的联动推广式试点扩散

“中央清晰—地方清晰”的政策类型主要是在央地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从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中掌握较为全面的政策信息，能够给予地方政府明确的目标指引和资源配置。同时，地方政府在试点工作中掌握了一手的政策信息，有较为明确的行动指南，能够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响应相关政策规定，以实践经验推动上级政策的进一步

完善和扩散,形成一种联动推广式的试点扩散方式。在职业教育上下结合的联动推广式试点扩散方式中,中央政府掌握较为充足的职业教育政策信息,通过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与地方政府进行互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充分解读中央政策精神,制定清晰的执行细则,并将试点中积累的经验反馈到上级主管部门,以推动政策进一步完善和下一轮试点扩散工作的开展。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为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2013年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此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逐步受到各级政策主体的关注,成为一种新的政策话语。特别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中央政府以具体的政策要求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安徽、河北、山西、江苏、河南等省份深入贯彻中央关于产教融合的各项政策文件精神,陆续发布了具有省域特色的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将政策精神落实到地方的具体实践场域^[25]。例如,江苏省政府根据中央的相关文件要求,于2018年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对江苏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样态进行统筹规划,明确各重要政策主体的责任,遴选一批职业院校和企业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并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资金、人力等资源支持。根据江苏省政府的政策安排,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职业院校开展了产教融合试点工作,各试点单位以探索产教深度融合模式,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依托职教园区等重点配套设施,逐步实现职业院校与地方产业的同步发展。各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的试点探索与经验成效,为上级主管部门提供了来自实践场域的重要政策反馈信息,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工具和配套措施提供了有力支撑。2019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在全国统筹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行业、企业建设试点,积累有益试点经验以促进相关政策的全国性扩散,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衔接^[26]。换言之,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府际关系,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过程中二者的互动方式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相互交织、互为传动的态势,自上而下的方向指引和自下而上的经验借鉴产生联动,形成联动推广式试点扩散方式。

四、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驱动机制

一项政策的试点扩散过程不仅是决策者集体协商的结果,更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复合型因素和所有利

益相关者共同推动下完成的^[27]。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这一系统工程中,不论是“自上而下的科层传达式”“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式”还是“上下结合的联动推广式”,都会受到政治政绩、社会需求、经济效益等各种动力因素以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并形成相应的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驱动机制,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 政治政绩驱动

在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中,政治政绩是理解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过程的重要切入点。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考核体制一般根据“德能勤绩廉”来评价和选拔干部,其中的“绩”即政绩,成为干部提拔、重用和升迁的重要指标,也成为领导干部推行相关政策的重要引擎^[28]。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等社会发展重要领域,是政府政绩的重要考量部分。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绩目标下,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着上级的目标引力、同级的竞争推力以及晋升的考核压力。在此背景下,为实现积累独特性政绩优势的政治目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倾向于选择以试点的方式积极寻求职业教育政策的创新扩散,以良好的改革决心和试点成效构建印象政绩,积极回应各方需求进而塑造更好的政治形象,凸显政绩竞争优势。

政治政绩驱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依据“上下逻辑”^[29],落实上级的政策要求。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中,率先公开出台新政策的地方政府不仅体现出对中央相关政策精神的拥护,而且能够尽早发现政策试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及时改进以取得更好的政绩,从而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与进一步支持。第二,依据“前后逻辑”,创新前人的改革举措。由于政绩具有个体性和不可继承性,新任官员往往会结合自身的执政特点以及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试行新的职业教育政策,通过创新性政策试点扩散来获得政绩。第三,依据“左右逻辑”,借鉴他人的优秀经验。各级政府进行政策活动具有明显的趋利避害性,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具有一定的风险。为了规避政策风险,避免政绩下滑,试点推动者往往会充分评估其他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后的收益情况,并对其在政策试点扩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式进行审视与学习,广泛吸取优秀经验以期获得更好的试点表现和政绩积累^[30]。因此,政治政绩驱动下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以及职业院校,通过开展职业教育政策试点的方式进行政策创新活动,以满足上级的期待和政绩考核要求,并积极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从而推动更大范围的职业教育政策扩散。

（二）社会需求驱动

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31]。职业教育作为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的教育类型，其适应性主要体现在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适配性发展。由此可见，社会需求是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供给的关键考量要素，也是推动其政策试点扩散的重要驱动力。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过程中，能否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满足多元利益主体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期望^[32]，成为衡量该政策可行性的指标。

社会需求是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重要动力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人才适配需求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人才既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系统的重要期望，也是职业教育政策需要及时回应的关键议题。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社会对于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要求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适时革新。而这种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变革需要以政策为导向，通过小范围试点探究相关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而总结实践经验进行更大范围的政策扩散。第二，技术应用需求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职业教育是产业链、技术链与教育链深度融合的场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应用需求是推动其政策供给的重要因素^[33]。在我国技能型社会构建过程中，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正走向深度技术化。作为技术创新、应用与推广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需要自觉承担起引领社会技术变革与实践的责任，通过相关政策试点和扩散来推动自身服务社会技术应用需求的能力。第三，社会公平需求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公平是一个社会基本的伦理准则和价值需求，关系到民众的福祉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34]。其中，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面向人人的教育类型，承担着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重要使命和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职责。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公平的现实需求是其重要的价值考量和实践推力。面对区域性、结构性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职业教育系统以政策创新为回应，通过政策的精准试点、经验总结以及有效扩散来改善教育公平状况，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因此，社会需求驱动

下的政府部门和职业院校，必须以社会对于人才、技术以及教育公平的全方位需求为政策试点扩散导向，以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长远利益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经济效益驱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推动社会各项创新活动的决定性因素。教育作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经济因素是推动教育活动创新变革的重要动力。而职业教育作为联结教育与市场的重要桥梁，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适应经济发展新格局，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的强大动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保持一致^[35]，并在此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动力，推进职业教育政策的试点扩散，不断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切实增强职业教育与经济体制的适应性。第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三大产业占比从“一三二”到“三一二”再到“三二一”的变化，并且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转移^[36]，这些变化客观上都要求职业教育政策进行创新，在试点扩散的进程中不断调整政策工具，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第三，财政补助激励推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财政补助激励机制是增强各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工作积极性的动力因素，也是提高职业教育政策扩散效率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于企业和民办职业院校等以经济效益为重要考量的政策主体而言，其参与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工作的关键利益诉求是获得相关的土地、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红利，降低经营成本，同时获得知名度、影响力等额外收益^[37]。而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过程中配套的补助激励机制能够有效降低试点单位的经济成本和创新风险，提高其经济效益，从而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到政策扩散的进程中^[38]。因此，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导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机遇，以财政补助激励为保障，以经济效益切实驱动职业教育政策试点扩散落到实处，进而推动职业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

参考文献

[1][31]新华社.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1-04-13)[2025-03-10].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13/content_5599267.htm.

- [2]徐成芳, 闫义夫.“政策试点”在改革创新中的四维功能论析[J].领导科学, 2018(5): 60-62.
- [3][27]王浦劬, 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6): 14-23.
- [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Z].发改社会〔2023〕699号, 2023-06-13.
- [5]熊亮州.职业本科教育试点的政策过程研究[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 [6]芦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试点: 成效、限度与反思[J].职教论坛, 2021(11): 6-12.
- [7][21]崔志钰, 陈鹏, 倪娟.职业教育政策试点: 逻辑特点、问题解析与改革建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123-133.
- [8]雷家彬.分类学与类型学: 国外高校分类研究的两种范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1(2): 110-118.
- [9]魏景容.政策文本如何影响政策扩散——基于四种类型政策的比较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87-95.
- [10]赵鹤.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类型重塑与深层逻辑——基于国际比较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 2023(6): 28-34.
- [11]韩志明.政策过程的模糊性及其策略模式——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J].学海, 2017(6): 109-115.
- [12]C. JUNG.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goal ambiguity to program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al ambiguity and performanc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4(2): 205-219.
- [13]朱德全, 沈家乐.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执行的框架与理论模型[J].教育研究, 2022(3): 110-126.
- [14]李阳.省级政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扩散机理[J].职教论坛, 2023(7): 5-16.
- [15]Karch A. 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J].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2007(1): 54-80.
- [16][17]李兆友, 郑晓敏.试点政策的模糊性与扩散模式分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与实践样态[J].求实, 2022(6): 26-36.
- [18][2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Z].国发〔2014〕19号, 2014-05-22.
- [19]彭召波.江苏推进现代学徒制的策略与模式[J].中国高校科技, 2020(3): 76-80.
- [20]周望.中国“政策试点”研究[D].天津: 南开大学, 2012.
- [22]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Z].国发〔2015〕3号, 2005-10-28.
- [23]潘意志, 程丹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广东改革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 2012(27): 12-15.
- [25]王辉, 陈鹏.地方深化产教融合政策的话语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职教论坛, 2019(2): 80-87.
- [26]郭梓华, 黄巨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参与探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 2023(22): 19-25.
- [28][29]陈家喜, 汪永成.政绩驱动: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分析[J].政治学研究, 2013(4): 50-56.
- [30]张端鸿, 陈庆.省级行政区域高等教育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机制研究——以“双一流”政策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 2019(7): 53-59.
- [32]曾令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内涵、逻辑与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 2024(34): 6-14.
- [33]杨兴波.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产业链—技术链—专业链”全贯穿式教学体系构建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 2023(11): 37-42.
- [34]张秀兰, 胡晓江, 屈智勇.关于教育决策机制与决策模式的思考——基于三十年教育发展与政策的回顾[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138-158+160.
- [35]梁宇森, 梁宇坤.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政策动因、内在逻辑及未来路向[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4): 164-168.
- [36]袁征.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J].教育与职业, 2022(19): 35-40.
- [37]冉云芳.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框架[J].教育发展研究, 2021(7): 44-52.
- [38]黄巨臣, 霍胜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试点”机制的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4(9): 75-83.

Diffusion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Pilot Program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Huang Juchen, Guo Zihua, Xiao Ran

Abstract Pilot programs serve a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diffusion of pilot programs has emerged as a localized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gradually becoming embedded within the complex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approach,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 type–diffusion mode–driving mechanism”. Start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o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the “clarity–ambiguity” of policies, it inductively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through vertical logic: “central clarity–local ambiguity”, “central ambiguity–local clarity”, and “central clarity–local clarity”. Correspondingly, three typical diffusion modes of pilot program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re proposed: “top–down hierarchical transmission”, “bottom–up absorption and radiation”, and “combined top–down and bottom–up linkage promo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major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these pilot diffusion activities, namely “political achievements”, “social demands”, and “economic benefit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policy pilot; policy diffusion; typology

Author Huang Ju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uo Zihua, research assistant of Lanzhou University; Xiao Ra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